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川陕交通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秘密交通网成为党指导根据地斗争、保持与苏区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川陕交通线从外部向川陕内部渗透进去，再从根据地内部向外部延展出来，把中央与四川党组织和川陕苏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效缓解了红四方面军入川后面临的经济与军事双重压力，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

## 输送优秀人才,加强川陕苏区领导力量

特派员赵仁夫给中央关于陕西地下交通工作的报告中，写到川陕交通线的形成：1934年秋，外部与陕北二十六军及北川四方面军的交通关系打通后，鉴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便另指定可靠同学专负责军事交通责任，管理汽车与运输事项”。

人才是领导革命斗争最宝贵的资源，党内干部的派遣和交流便成为交通线的首要职责。党组织通过交通线，向根据地派遣了政治军事干部和专门技术人员，有效保证了党对根据地斗争的领导作用。潘自力、张光远、汪锋、刘顺元等干部，都是汉中地下党组织派人通过交通线进入苏区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化名何柳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则是由四川党组织地下交通护送，取道三台、盐亭、南部、阆中、苍溪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巴中的。据统计，1933年至1934年，通过交通线前往川陕根据地的有绵阳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团员和革命群众200余人。其中包括：三台中心县委书记胡曼石、共青团三台中心县委书记陈子谦、盐亭特支委员会委员阮超杰，等等。

## 传递重要文件、情报、报刊,确保川陕苏区信息畅通

传递文件和各种情报是秘密交通线的基本任务。重要文件大多以药水密写在衬衣或者字画、手绢的背面和线装书的反面来对付检查。1934年冬，时任中共陕南特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德生为了将文件从上海中央局带入川陕苏区，“穿了一套上海中央局密写的衬衣，经汉中大巴山进入川陕苏区”。红军总部发表的一月宣言就是通过交通线秘密传送到西北军中去的，甚至一度送到杨虎城、孙蔚如等人手中。

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参谋长志平，作为杨虎城特使于1933年5月21日到达四川通江两河口，将国民党军队中使用的信号、口令、地对空联络信号、识别旗、密码等文件和地图交给红四方面军政

治部副主任傅钟。大量军事情报通过交通线传送给红四方面军，产生了巨大作用。正如傅钟所指出，武志平同志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不仅为我军在川陕作战接连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在震惊世界的长征中，陕甘省军用地图，对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先期到达陕北，也发挥了作用；而密码底本，对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及时破译敌军密电，掌握马家军动向，同匪徒进行殊死战斗，也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敌人的封锁，《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宋绮云等同志搜集报刊、书籍交给武志平，再通过交通线送往苏区，解决苏区信息不通的问题。

## 运送紧缺物资,缓解川陕苏区生活困难

输送军民紧缺物资到苏区，同时从苏区运出富余物资是交通线上一项艰巨的高风险任务。无线电器材、药品、医疗器械、印刷器材、电池、汽油、布匹、食盐、枪支弹药等物资经常来往于白区与苏区的交通线上。

时任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余洪远回忆：我们的全部军用地图，川、陕、甘，还包括河南、湖北等几个省的军用地图，全由杨虎城那里印好后给我们送来。川陕苏区使用的电话设备总机（15门、20门和25门总机）部分是从西安、重庆、成都等地采购通过秘密交通线到达根据地的。时任三十八军军部无线电总台报务员唐小尧回忆：“我亲见封台长送给他菲利普收发报真空管十余个，45UB电池与1.5A电池二十余只。武志平经常来我们电台，由封台长用便纸写成电文发出，有时他自己发，有时由我发，发后武就收回电报底稿。现在看来，这可能是用的另一种通讯手段。”

通过秘密交通线派遣地下工作人员或经由可靠的商人，把根据地收购的如白耳、茶叶、天麻、党参、麝香、五倍子等土特产品利用北方开辟的交通运输线运往汉中出售之后，换回苏区所急需的食盐、药材、手枪、电池等物资。“经济公社利用与三十八军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从北方开辟的交通运输线，将这些土特产，运往汉中为土特产的外销开辟了门路。”

## 培养锻炼了一批政治坚定、训练有素的交通员队伍

要保证交通线顺畅，交通员的作用至关重要。在红色交通线这个特殊的战场，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做交通工作，政治坚定、训练有素是至关重要的。

1930年11月刘伯坚给南方局的报告中强调通过政治教育提高交通人员政治觉悟的必要性，“交通人员的选择，不单是注意技术方面，要特别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方面，在做交通工作前及做交通工作中，都要有政治教育的机会。（第一次做交通工作的就没有政治觉悟，在危急〔时〕不给我们〔带〕路，只顾分抢我们的行李。”）”曾经做过陕西省委交通员的赵乃鼎根据自己多年工作体会得出好交通员应该具有的优良品质：“交通员必须对党忠诚，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处处要以党的利益、党的安全为重，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他甚至提出“好说梦话的人，最好不用”的要求，因为这样的人容易坏事。即使有的好同志，怕自己说梦话泄密，宁可晚上不睡觉，但毕竟是不适合交通工作要求的。

交通员要具有胆大心细、记忆力强、遇事冷静、随机应变的良好素质。江渭川在《地下党川陕苏区女情报交通员贾世荣》一文中谈道：1933年冬，贾世荣当上正式交通员。由于她善于隐蔽、训练有素，“总是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情报资料安全可靠，万无一失”，都能出色地完成情报交换任务。

《红色交通线上的背二哥》《文件缝在衣中央》《请问“那边的武参谋长”》等陕南红色歌谣再现了活跃在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为红军运送物资、文件的场景。除武志平之外，川陕交通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交通员，如文俊（汪克明）、郭德康、喻殿臣、余国俊、赵济舟、陈幼麟、赵维岳、余晴初、李紫瑜（女）、尹芳垣、钟光禄、陈文胜。其中，镇巴黎坝交通站的黎正刚、王三珍夫妇提供自家宅院设立秘密交通站并担任交通员，多次冒着危险为红军运送物资和情报。年仅18岁的遂宁交通站主任马瑞宁经敌人多次严刑拷打，始终未供出交通站的任何情况，高呼“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

# 山或崩,石或烂,烈士精神终古焕

## ——马鞍山抗日烈士碑碑文敬读

□ 田 菁



马鞍山抗日烈士碑坐落在山东省原博山县（今淄博市淄川区）马鞍山主峰南侧山腰处，1945年博山县政府为纪念马鞍山抗日烈士而建。纪念碑通高2.7米，碑身为六棱青石柱。碑身正面镌刻着原鲁山区专员徐化鲁题写的“气壮山河”四个醒人大字。碑身西南面铭刻着在马鞍山保卫战中牺牲的27名烈士的姓名。碑身西北面镌刻着原博山县县长毛梓材的《马鞍山抗日烈士赞》题词：“奇男儿，守空山，频将敌伪截断。飞机大炮山可撼，壮士英风不变！审知军械势悬殊，浴血运石仍抗战。拼头颅，使敌伪惊服；这气节，教人民敬念。山或崩，石或烂，烈士精神终古焕！”碑身东北、东南面及南面镌刻着博山县政府起草的悼念马鞍山抗日烈士的碑文，全文如下：

马鞍山的烈士们：

你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模范优秀的儿女，你们有的同敌人战斗负过几次伤；有的为工作损害了身体；但是你们始终不愿放下革命的武器，在修（休）养中，你们仍担负了革命重担。控制了马鞍山这重要阵地打击阻止着敌伪，保卫了根据地和人民。到如今你们的尸骨虽然腐烂，但人们对你们却保留了永远的敬爱 and 思念！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这是使人永不会忘记的光荣日子。日寇为了摧毁我根据地，抢掠烧杀我人民，首先对你们这些外围阵地上的战士，以超越数十倍的雄厚力量，进行攻击，十余架飞机盘旋在上空投弹，大炮像夏雨时的雷声，轻重机枪像秋后的狂风。你们在王凤麟同志领导下，是多么沉着英勇和坚定，以土造枪和手榴（榴）弹抵抗着现代化的兵器，击退了日寇数次攻击，敌人伤亡百余，你们对艰险毫不畏惧。这样苦战了两天一夜，造成战史上不可抹（磨）灭的奇绩（迹）。最后敌人更加凶狠和疯狂，你们也更加奋（愤）怒和紧张！但是你们的弹药却完全用尽，男女老小不得不搬运石块作战。抗属老人冯旭臣脸上充满了血流，奔驰在炮火下，王凤麟同志躺在血泊中，已不能再动。但杀敌的喊声，使敌感到心惊，最后敌人冲上了山顶，你们就毫不犹豫的保持了中华民族崇高的气节，把枪支完全砸碎，连六七岁的孩子也不愿做俘虏（虏），都坚决的跳下了悬崖壮烈的牺牲了！敌人用了极大的代价，所得的是空山头一个，证明了中国人民是永不会被战胜的。你们的鲜血，在抗战中写下了一页辉煌的历史，这是你们无上的光荣！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无上的光荣！我们将永远追念着你们，向你们学习，继承你们的伟大事业而前进！

博山县政府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

碑文语言凝练、行文流畅，真实再现了马鞍山抗日保卫战的悲壮历程和激烈战斗场景，深情讴歌了革命先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敬读碑文，对革命先烈的景仰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 出敌不意,智取奇峰

马鞍山，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淄河上游，峰峦陡立，悬崖如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鲁中通往渤海地区、胶东地区的交通要道，是我军和敌伪顽寇必争之地。

# “布尔什维克气节与世长存”的任作民

□ 陈安杰

任作民1899年出生于湖南湘阴（今汨罗市）一个中农家庭。他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在上海、河南、山东、湖南等地负责党的地下领导工作，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等职。任作民两次被捕，被关押在监狱里长达7年，受尽各种酷刑，但从未泄露党的秘密。1942年2月20日，由于劳累过度病逝，时年43岁。

立志赶走“一切害人虫”。1916年，任作民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在校期间表达了对国事的担忧，他在日记中写道：“清朝腐败无能，外交失败，割地赔款，陷害人民，我长大成人，一定要随千军万马，赶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的贪官污吏以及一切害人虫”。1919年5月任作民去上海的一家纺织厂做工，筹资赴法勤工俭学未果，回家乡湘阴养病。

1920年秋，经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任作民与堂弟任弼时等人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与刘少奇、罗亦农等成为同学，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外国语学社的学员除了学习外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之外，还特别重视学员的社会实践，安排学员到工厂调查、帮助编辑报刊、到街上散发传单、参加工人罢工等，以多种形式开展革命活动。任作民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建团时期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早期党组织决定送任作民等青年团员赴俄留学，培养中国革命亟需的革命者。

1921年，任作民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1月在罗亦农、刘少奇介绍下，任作民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当时，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相继在莫斯科召开，任作民、罗亦农、刘少奇等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参加了大会，聆听了列宁的报告，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同年2月，共产国际因工作需要，把任作民从东方大学抽调出来分配到苏联远东地区，参与领导苏联境内的中国工人运动，负责主编《工人之路》，并任报社党支部书记。5月，任作民由赤塔到海参崴，继续编辑报纸，后改任远东职工会中国分会会长。次年6月，由海参崴到伯力，参加全俄工联远东局，在赤塔任省工联中国工部部部长。

把监狱变成“革命者的休养所和学校”。1925年4月，任作民奉党中央电召，由赤塔回国。5月到达上海，在党中央秘书处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兼管会计。1927年9月，任作民被党中央派往开封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因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任作民更名为任弼。

1941年下半年，日寇为了控制淄河流域，派兵占据了马鞍山，并在马鞍山上和周围村庄修建了炮楼、设置了据点，封锁了鲁中到渤海地区、胶东抗日根据地往来通道。1942年春末夏初，山东纵队第四旅旅长廖容标率领部队来到淄河流域，决定出敌不意，智取奇峰，夺回马鞍山。部队组成了由特务营营长王法山和侦察科科长刘锡琨为正副队长的七人突击队，在两个排兵力的配合下，决定直插马鞍山后崖。七勇士每人携带一支匣枪、一把大刀、几颗手榴弹，另带着绳索备用。为了避免惊动敌人，他们全部打赤脚。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攀越了道道陡直的峭壁。其间曾被敌人新修的一堵高三丈的石墙挡住了去路，七勇士硬是搭起人梯、用大刀把石块缝隙刷开，顽强攀登，终于历尽艰险，攀上了绝壁，一枪未发，活捉了一个守山伪军分队，夺回了马鞍山。当时一个敌军班长发现上山的八路军寥寥无几时，非常惊奇地问：“我敢问你们是怎么上来的吗？”七勇士回答：“我们是坐气球上来的。”对此，淄河流域的群众编了一首歌谣：“一马平川淄河滩，一夫当关马鞍山，一伙神兵从天降，一窝汉奸一锅端。”

## “人在山在”扼守天险

1942年11月，侵华日军开始对鲁中地区实行大“扫荡”。9日，日军包围了马鞍山。他们汇集了1000多名日伪军和几百名汉奸，凭借着数十倍于我军的兵力，在飞机、大炮、重机枪的掩护下，向马鞍山发起了猖狂进攻，马鞍山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当时，山上只有我军一个班的正式部队，其余均为伤病员和抗属，共30余人，凭险据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因右腿负伤截肢在山上休养，并担负指挥守山任务。王凤麟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希望“能为党工作二十年”。1939年11月，党中央电令任作民“携眷赴延”。1940年2月到达延安后，奉命到马列学院学习。10月，任作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担任秘书长，分管机关党务及西北局工、青、妇等群团工作。妻子丁祝华看到任作民日夜忙碌不停，身体日渐消瘦，让他注意身体，劳逸结合，任作民却说：“我多少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忙一点有什么要紧。”

1933年2月，因叛徒出卖，任作民在济南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并施以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他在回忆录中说：“说服不见成效后，即用苛刑，我晕死过去，数次后终止审讯”。特务“给我们的下马威是每人一副七斤以上的大脚镣和一双手铐，吃饭大小便的自由一概剥夺净尽……”“五日以后，手铐才去掉，脚镣就成了以后数年的长期伴侣”。任作民在狱中遵照党的要求，一刻也没有忘记与敌人斗争，办起短期培训班，培训班中的活跃分子，抓住时机开展绝食斗争，提高政治犯的斗争意志。他勉励难友们狱中要注重“保健”和“学习”，把监狱变成“革命者的休养所和学校”。

1937年2月，任作民等19人被押送到武昌“反省院”，他坚持“不求出院，不损害党的组织和政治影响，这个立场坚定不变”。他带领难友进行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10月，经董必武营救出狱，回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1月，任作民任中共湖南特委书记，领导整顿恢复和新建了2个区委、24个支部。任作民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共同指导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并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出版了《中苏》半月刊、《中苏小丛书》，还办有俄文补习学校，培训学员300余人。1938年，任作民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长沙市委书记等职。

提出“人在山在”的战斗口号。山上的伤病员、家属、老人、小孩都积极行动起来，用手榴弹、石头和仅有的几杆枪顽强阻击敌人。时任鲁中区民政处副处长的谭克平带领6名战士坚守南天门，他们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战斗中谭克平不幸中弹，英勇牺牲。王凤麟也不幸胸部中弹，倒在血泊中。汉奸劝王凤麟投降，遭到他的呵斥：投降的不是中国人！说完用手枪中最后一颗子弹弹枪自尽，壮烈殉国！爆破英雄刘厥兰把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敌人后，纵身跳下悬崖，由于树枝托挂才幸免于难。这次战斗，击毙敌人100多人，消耗了敌军大量的物资，为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突围、转移创造了极为难得的战机。

## “一门忠烈”勇赴国难

马鞍山保卫战中，27名烈士为祖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抗日壮举。抗属老人冯旭臣，在抗战爆发后，带领全家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在他的支持和带动下，他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八路军。其长子冯登奎在1942年8月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在马鞍山保卫战中，冯旭臣老人冒着炮火为战士们运送弹药、搬运石头，并高声呐喊：“宁可死在炮火中，也绝不当俘虏！”鼓舞士气、激扬斗志，最后不幸中弹牺牲；其女儿冯文秀身负重伤依然坚持战斗，在把最后的石块狠狠砸向敌人后，跳下悬崖，为国捐躯；冯旭臣老人的儿媳孙玉兰负责山上战士们的伙食及护理伤员工作，在突围时，她的大女儿被敌人炮弹炸死，她与二女儿、三女儿在转移中不幸坠崖，全部遇难。在马鞍山保卫战中，冯旭臣一家六口人壮烈殉国，谱写了山东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被原鲁中行署誉为“一门忠烈”。

希望“能为党工作二十年”。1939年11月，党中央电令任作民“携眷赴延”。1940年2月到达延安后，奉命到马列学院学习。10月，任作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担任秘书长，分管机关党务及西北局工、青、妇等群团工作。妻子丁祝华看到任作民日夜忙碌不停，身体日渐消瘦，让他注意身体，劳逸结合，任作民却说：“我多少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忙一点有什么要紧。”

1942年2月19日，任作民由于劳累过度，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经抢救无效，于2月20日去世。任作民在病危时还断断续续地说：“革命二十年，为党只工作了十三年，七年身系监狱，我相信能活到六十岁，再为党工作二十年。”任作民这位为党奋斗一生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未能实现继续为党工作的愿望，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精神风范，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在延安宝塔山下的延水河畔任作民的墓碑前，正面由毛泽东亲自题写“任作民同志墓”。背面写着：“作民同志为党奋斗二十年如一日，临难不苟，大义凛然，入狱时全身烙刑伤痕宛然，布尔什维克气节与世长存。”1983年陈云为任作民题词：“任作民同志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都曾与我共事过一个短时间。他是我党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是一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同志。”

